



伫立于今河南偃师缙山之巔的《升仙太子碑》，是唐代著名碑刻之一，其碑文号称武后亲自撰书，因而在书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上接 10 版）

检校模勒使朝议大夫□□议大夫上柱国□庭海”、“奉敕检校树碑使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解州诸军事解州刺史上缺”两行。而在第四、第五部分，“御制”及“制”，如空间许可，都提行刻写，因此被铲去的一行可能原本仅为“一奉”字。而勒碑使姓名，《金石萃编》已据《旧唐书》考为薛稷，可从。

而此碑的刊刻时间，因为神龙二年题记中有“奉制刊碑刻石为记”一句，故自清代以来便已聚讼纷纭。以王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此碑的建立应在神龙二年，但也有学者坚持此碑刻于圣历二年。何者为是，我们仍需从碑文本身及碑阴题名提供的信息入手，而第三个问题，也可在此一并解决。

理论上讲，碑文中保留了大量的武后新字，自然应当信从圣历二年的建碑时间。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神龙建碑而保留武后御书原始面貌的可能

性。但是碑阴题名结衔，尤其是碑右侧造碑刻字诸臣题名中所保留的武后时代特有的官名已经否定了这一可能性。

以居中的勒碑使题名为界，碑阴左右两侧题名之间形成了自然的分割，左侧是当时在位诸相的题名，而右侧的所有题名则关乎采石、模勒御字、刻字、书写碑阴等一系列具体的碑刻制造过程，实际上是一份造碑责任者题名。这份题名无疑是碑刻生产过程中极为宝贵的材料，对我们重建《升仙太子碑》的生产过程有着重要意义。这份名单依照先官后吏，从左往右、从上往下的顺序排列。从这份责任者名单中我们很清晰地看到造碑过程中细致的分工：碑额“升仙太子之碑”、正文第一行“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御制御书”、篇末“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朔十九日壬寅建”以及碑阴武三思至吉项题名系薛稷所书。碑材系来庭县尉□峻负责采择。钟绍京和李元□负责模勒御字，韩神感

和朱罗门负责刻御字。最右侧“题诸□等名左春坊录事直凤阁臣钟绍京书、□□□□臣卓勒□、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三行已不太能看清，这几行字所在的部分，有大片的石花，不少研究者因此认为碑上原题有武后时代诸王之名，后被铲去。但细审拓片，碑阴右上段虽有大片石花，但较第三部分勒碑使姓名处的人为铲凿痕迹要浅得多，且石花断续处露出碑石本底，并无唐代写刻痕迹，而右侧所有责任者题名都迭压于石花之上，因此这一区域的石花可能系碑石本身所有。而勒碑使之右皆是负责具体造碑事务的官吏，即使武后欲令诸王题名其上，亦不会在此区域。因此，碑阴原本并未刻有所谓“诸王等名”。那么所谓“题诸□等名”究竟为何？考虑到此碑每一字的书、刻皆有责任者题名，而造碑使及书字、刻写诸人题名的书刻责任人尚未有归属，疑此三行即记此内容，也就是说，从造碑使以下采石、书、刻诸人题名，由钟绍京书写，卓某及麟台楷书令史臣□伯刻字。这一份分工明确的责任者名单表明，此时此刻整块碑石已经全部完成。而造碑责任者的结衔无一例外地保留着武后时候特有的官称和武周新字，这些低级官吏的名字不可能出于事后追题，更不可能在事后仍保留着当时的官衔，因此圣历二年六月立碑时间当无可怀疑。

至此笔者对围绕此碑的三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然而此碑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实际上此碑的生成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需要从武后撰写碑文的那一刻开始说起。虽然碑文本身并没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不过碑阴第一部分的宰臣结衔为我们提供了线索。魏元忠、吉项分别以凤阁侍郎和天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在圣历二年二月，娄师德再为纳言在同年三月甲戌（十八日），而四月壬辰（初七），魏元忠已检校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总管，并令娄师德副之，因此魏、元二位当在不久后即离都赴任。因此这份名单的题署早于圣历二年六月十九日的建碑时间，很可能即是在武后碑文完成之后不久，因此碑文应作于圣历二年三四月间。而据《旧唐书·武后纪》的记载，就在此前一个多月，武后在赴嵩山途中专程“过王子晋庙”，可以想象，王子晋这一意象激起了武后特别的感受，才会使她在一个多月后写下了这篇长达两千多字的鸿篇巨制。而碑文的撰作时间也提示我们，同年六月十九日建碑之时，题名诸臣并未齐聚缙山、共襄盛事，

而这恰恰反映了当时当地武后对于升仙太子传说的重视——因为这些题名并非非常建碑仪式中对现场参与者的记录，而是在碑文完成后不久，所有在任宰相对于碑文本身的联署，在一定意义上有着政治背书的意味，由此我们可以看见武后对于此碑的郑重其事。

圣历二年六月，《升仙太子碑》在缙山之巔竖立起来，然而，随着女皇心绪的变化，这块石碑还在继续着它不同寻常的生长史。碑阴第一部分武后御撰《杂言游仙篇》的书丹者是奉宸大夫薛曜。控鹤府改奉宸府，《通鉴》系于久视元年六月（700），这提示我们，这部分内容要比碑文和碑阴第二、三、四部分的形成时间要晚一些。考本年四月，武后幸嵩山三阳宫，五月改元久视，七月返回洛阳。《游仙篇》篇末出现了久视的年号，提示我们诗应作于改元之后。按武后本次改元缘于五月的一场大病，赖僧人胡超所合“长生药”方使御体平复，诗中所表达的愿仙人赐与灵药令其长生的期冀正与她病后初愈的情绪相合，因此武后应于七月返回洛阳时又一次取道缙山，遂刊此诗于碑阴额部。是为此碑的第二次刊刻。

神龙元年（705），武后逊位，同年崩逝，然而这块碑的生命历程却仍在继续。神龙二年，不知何故，相王李旦奉中宗之命，率王府僚佐在碑阴的下部“刊碑刻石为记”，并留下了第五部分的题名。这是此碑的第三次刊刻，去此碑初建已是七年之后。

综上所述，《升仙太子碑》及其碑阴题名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生成过程：在圣历二年庄重立碑之后，武后和中宗都在其后的若干年中在碑阴刊刻了新的内容，而每一次刊刻或许都包含着耐人寻味的含义，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寻。

《升仙太子碑》背后的幽微内心世界

从《升仙太子碑》颇为复杂的生成史，我们可以看到武后对于此碑郑重其事的态度和持续的关注，故而这块碑石所承载的意义，不可能如后人轻薄地认为的那样，向天下宣示她对二张的宠爱。

值得注意的是，在碑文之中，武后特别强调了王子乔的太子身份，虽然在《逸周书》和《国语》的记载中，王子乔的确是周灵王的太子，曾经劝谏灵

王勿壅塞穀洛二水，不过汉代之后，他通常以王子的身份出现在后世的记忆中，无论是《列仙传》《潜夫论》还是传为蔡邕所撰的《王子乔碑》，皆称其为“王子乔”，被突出的都是他骑鹤升仙的真人形象。但是在武后的表达中，她特意化用了几乎已被后世遗忘的《国语》中王子乔谏周灵王壅穀洛二水的典故来表现其作为储君的担当，甚至还加入了犯颜进谏这一《国语》中并不存在的情节。而这一情节或许会让人联想到曾因请嫁高宗二位公主而触怒武后的太子李弘。事实上在缙山西北7公里左右，即是死后被谥为孝敬皇帝的李弘恭陵所在地，即使在今天，从缙山北望，恭陵所在仍隐约可见，很难想象武后经行此地之时，会完全没有想起长眠于此的故太子。

李弘是武后与高宗的长子，上元二年（675）四月己亥（25日）薨于合璧宫。有关他的死亡，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高宗实录》《旧唐书·高宗纪》及其本传都不载死因，成书于肃宗时代的柳芳《唐历》则谓其“以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大约同时，李泌亦谓“天后方图临朝，乃鸩杀孝敬”（《旧唐书·承天皇帝俊传》）。《新唐书》纪传则直接取李泌的说法，坐实了武后为谋篡位，鸩杀李弘的罪名。因此历来对于他的死因多有争论，或同意《新唐书》之说，谓为武后所杀，或仍愿根据唐代官修史书系统的记载，相信他只是因病而亡。但是如若我们考察一下以上各条史料的可信度以及李弘去世前后的活动轨迹和政治情势，或许可以对他突然薨逝的内情有更多了解。

众所周知，官修史书天然有着为尊者讳的义务，既然高宗用制敕和碑文向天下昭告太子的死因是病亡，史官的书写当然不可能背离这一官方口径，因此《旧唐书》及司马光所见到的《实录》里对此没有特别的表述，本就是官修史书的正常状态。而李弘不以寿终的最早记载见诸柳芳《唐历》。柳芳，肃宗朝史官，唐代前期所修的纪传体《国史》在他手中续至一百三十卷，并流传后世，成为《旧唐书》前半部分的蓝本，而据《旧唐书·柳登传》，柳芳曾以“以所疑禁中事，咨于（高）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因此《唐历》的史料来源相当一部分得诸高力士的见闻，而从撰作态度而言，